

目摇摇录

星火集

第摇一辑

摇摇论工作	(猿)
摇摇论本位文化	(苑)
摇摇论救救孩子	(员猿)
摇摇论周作人事件	(员怨)
摇摇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	(圆原)
摇摇坐人力车有感	(圆愿)
摇摇论家族主义	(猿)

第摇二辑

摇摇川陕路上杂记	(猿)
摇摇我歌唱延安	(猿怨)
摇摇日本侵略者的悲剧	(源)
摇摇一个太原的小学生	(缘)

何其芳全集 第二卷

老百姓和军队 (远)

第三辑

一个平常的故事 (苑)
论快乐 (愿)
饥饿 (怨)
后记一 (愿)
后记二 (苑)
后记三 (苑)

星火集续编

重庆随笔

“自由太多”屋丛话 (苑)
序 (苑)
文学无用论 (苑)
尽信书，不如无书 (苑)
历史与现实 (苑)
学习社会 (苑)
傻女婿的故事 (苑)
过年有感 (苑)
异想天开录 (苑)

目 录

摇摇摇解题	(猿缘)
摇摇摇摇“父兄”论	(猿远)
摇摇摇摇从“分赃”说起	(猿苑)
摇摇南行纪事	(猿怨)
摇摇重庆随笔	(猿源)
摇摇摇摇重庆的市容	(猿源)
摇摇摇摇“真民主”的选举	(猿远)
摇摇摇摇衣冠问题	(猿怨)
摇摇摇摇下江人及其他	(猿怨)
摇摇理性与历史	(猿缘)
摇摇金钱世界	(猿猿)
摇摇关于实事求是	(猿缘)
摇摇谈读书	(猿员)
摇摇谈苦闷	(猿怨)
摇摇谈朋友	(猿缘)
摇摇忆若飞同志	(猿员)
摇摇记冼星海同志	(猿源)
摇摇悼闻一多先生	(猿怨)

回 忆 延 安

摇摇引子	(猿源)
摇摇差别	(猿远)
摇摇寻牛寻马	(猿怨)

何其芳全集 第二卷

延安的小孩子 (四四)

记王震将军 (四四)

记贺龙将军 (四四)

朱总司令的话 (四四)

韩同志和监狱 (四四)

谷老 (四四)

人情 (四四)

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

最早的爱国思想 (四四)

戊戌新政的宣传者 (四四)

君主立宪思想的改变 (四四)

准备黄花岗起义 (四四)

荣县起义 (四四)

内江起义 (四四)

反对袁世凯 (四四)

加入共产党 (四四)

创办中法学校 (四四)

筹备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 (四四)

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 (四四)

大革命失败 (四四)

在苏联 (四四)

自我批评精神 (四四)

目 录

摇摇抗战后做国际宣传工作	(四八)
摇摇整风运动	(四九)
摇摇被迫撤离重庆	(五〇)
摇摇七十岁	(五一)
摇摇后记一	(五二)
摇摇后记二	(五三)

关于现实主义

摇摇序	(五五)
-----------	--------

第 一 辑

摇摇杂记三则	(五七)
摇摇论文学教育	(五八)
摇摇两种不同的道路	(五九)
摇摇改造自己，改造艺术	(六〇)

第 二 辑

摇摇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	(六一)
摇摇谈写诗	(六二)
摇摇关于现实主义	(六三)
摇摇略论当前的文艺问题	(六四)

何其芳全集 第二卷

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 (源苑)

论鲁迅的方向 (源苑)

文艺的堕落 (源苑)

报告文学纵横谈 (源苑)

一封谈写作的信 (源愿)

谈民间文学 (源愿)

从搜集到写定 (源愿)

第三辑

评《万世师表》 (源员)

《清明前后》的现实意义..... (源苑)

评《芳草天涯》 (源员)

评《天国春秋》 (源愿)

评《岁寒图》 (源愿)

关于《家》 (缘员)

星摇火摇集

摇摇本书收入何其芳 1935 年至 1955 年间创作的散文、杂论 140 余篇，1955 年 12 月群益出版社初版，1983 年 12 月再版。现以 1983 年 12 月新文艺出版社新版为底本编入。

第摇一摇辑

论摇工摇作

摇摇去年在一个县里的师范学校里教书。有一次，学校奉了上面的命令，要组织战时后方服务团。这也好，我想，可以大家都做一点课外的工作了，不是教书的和读书的都感到仅仅过课堂生活的苦闷吗。于是我说出一点意见。我认为这类工作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我们教书的处一个参加或者补助的地位。至少应该在那服务团中的各组里找一两位学生来负一部分责任，比如名义就叫干事之类。因为我总相信学生们负起责任来自动的作才作得好的，而且在一个学校里，学生究竟是主体呀。然而我像在真空中说话一样，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赞和，也没有人说出我的意见为什么不行。

不过那服务团终于产生了：校长是团长，一部分教职员是各组组长，另外一部分剩下来的教职员是组员。学生也是组员，每人选择加入一组。工作呢，且慢，还要训练，还要四个礼拜的训练。

谁来训练呢，仍然是教职员，不过在正课之外增加了几点钟而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摇摇第二卷

已。受训练的不用说仍然是学生。大概人们都相信教国文的就是一定认识几个字，而认识几个字的就一定会宣传吧，我被派为宣传组的组员，并且被通知要去训练另外的组员了。我只去上了一点钟这种古怪的训练，以后就不遵命了。我的“训练”是这样开头的：

“今天我想随便和同学们谈几句话。依照学校的规定，这叫做训练，不过依照事实，这仍是随便谈谈。因为说到训练，恐怕应该我来受同学们的训练。因为我几乎从来没有作过宣传工作。不过学校奉命组织战时后方服务团，我们也就得来奉命训练，而且同学们将来还得出去奉命宣传。在我们国家里，凡是奉命而作的工作总是常常作不好的。我们的敌人曾经嘲笑过我们的国家为‘文字之国’。现在我回到四川来更有一点感想，似乎敌人的刻薄话还不够刻薄，还可以改作‘公文之国’。我们只看见公文来，公文去，旁的文字倒少看见的。不过我仍然希望同学们借这个机会认真作一点工作，不要想着是‘奉命’，要当着是自动的起来作一样。并且我希望同学们在四个礼拜之后，从实际的工作的经验里去得到训练。那才是有益的训练。那才是真正的训练……”

四个礼拜是很快就过去了。旁人训练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训练了四个礼拜之后就完了，什么都完了。就是说以后并没有做什么工作。这却是我所没有意料到的。

由上面来的这样那样的命令仍是没有完地来，有些要学校作一点事才能回报，有些就仅仅需要一封公文。有一次，又奉到命令了，要教职员们出去作三天“征兵保国”的宣传。学校当局考虑的结果，打一个折扣，改成一天半，在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举行。这一次我没

星火集

有去。我想我也可以把它打一个折扣，打成完全不作。因为第一，我感到自己不能去向那些乡场上的农人说，“你们去当兵吧，去死吧，好让我们在后方当专聘教员。”第二，我怀疑那种站在茶馆里的板凳上，或者站在比板凳更高的桌子上的演讲式的宣传收得到多少效果。

这一类的后方工作情形使我有点儿不满。

在我自己，觉得比较可以表出我当时的那种心境的就是这字眼，不满，然而旁人却开玩笑似地称我为“悲观论者”了。他们的意思仿佛说，“你这样也不满，那样也不满，不是悲观是什么？”他们的态度，他们认为比较正确的态度大概是这样：国家的情形现在是不很好的，但一定会好起来；前方现在是当然要打败仗的，但将来会打胜仗；后方现在是当然有很多的毛病的，但我们也无法尽力，因为受着环境的限制。对于国家的将来和抗战的前途我同样的并不悲观，不过，我和他们的意见的分歧点在这里：我认为这将来这前途是要通过一个巨大的或者还是长长的苦难的，并不是像说说好听的话那样容易。同时这苦难，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那些勇敢的士兵一同背负起来。就是说应该极力的做着直接或间接对于抗战有利的工作，无论在前方，在后方。只是这样也不满，那样也不满，而不做这种工作的是不行的；只是说着“最后胜利必属我们”，而坐在旁边，不伸出他的白净的手来做这种工作的也同样要不得。

我苦闷。我对自己也不满。我似乎就属于那第一种不行的人。但苦闷，不满，无论对于环境或自己，都是好的。再进一步便是认真的工作。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摇摇第二卷

这时候前线的消息是继续传来：太原失陷，上海失陷，南京失陷。这时候笑我为“悲观论者”的人们变得悲观起来了，对于抗战的信心起了动摇。这时候轮到我说活了。我说，“当你们都悲观起来的时候我却变成一个乐观论者了。”这不仅是一句开玩笑的话而已，我的意思是当大家都觉悟到坐着等最后胜利是不可靠的以后，或者大家都会再进一步来作一些对抗战有利的工作了。

然而我仍是常常听见这样的抱怨：受着环境的限制。

客观的存在着的环境的限制是不能抹杀的。不过工作有着许多的种类，许多的作法，这惟一的理由是不够作为懒惰，苟安，以及东方式的个人主义之类的辩解的，因为被石头压着的树子也还可以生长。现在我更想起了最近来成都后一位朋友的话，“工作没有地域性”。这是他的一篇未写的文章的题目。在原则上，这句话的含义我是赞同的。不过，他倒不是针对着那些有能力做工作而不做的人们而说，他是打算谈论一下最近一半年来青年们到陕北去的问题。他并且附带的提及，他知道有一个失恋的人也要到陕北去。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出我的异议了。就我所知（我所知的事实自然是很有局限的），到陕北去的多半是准备去受训练的，他们多半认为普通的学校负不起训练他们的责任，或者那种普通的训练不合乎他们目前的需要，因此毅然到另外一个环境去进学校，没有什么可非难的。至于他们是在失业之后，或者失学之后，或者失恋之后才去，还是在什么也没有失之前就去，都不必追问。比如说那个失恋的人吧，他因为失恋而到陕北去，不比因为失恋而自杀，而颓废，而糊涂下去强得多吗？

星火集

同时我们这些自以为不必或不愿受什么训练的人也应该问一问自己了：到底我们做过了一些什么，正在做些什么，和打算做什么。

或者把“我们”的范围更缩小一些吧，让它仅仅指着平常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一个先决的问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现在放不放弃文学工作？其次，假若不放弃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依我个人的意见，假若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做更切实，更有效，更有利于抗战的事情，放弃文学工作并不是可惋惜的。我们不至于那样狂妄，自以为我们这民族的未来的伟大文学作品一定将在我们的手里产生。相反的，我们相信脱离了人生，脱离了时代，脱离了为这民族的自由而战斗，而死伤，而受着苦难的群众，无论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不会伟大起来。我们更不至于那样丧心病狂，抱着亡国士大夫的见解，如一个叫做《文化新闻》的小刊物所载的武汉大学的某教授对学生们所说的话，“你们还是安心读书吧，亡了国后你们还可以当泰戈尔”；相反的，我们愿意用一万个泰戈尔换取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国家。

不过，同样地依我个人的意见，我们的手里还没有另外的武器来代替之前，我们仍然不必放弃文学工作。我们应该更勤苦更热情地负起抗战中的文学工作的责任。这里就有着一个态度问题了。在战争中，文学工作者有两种显明的不同的态度：热烈地关心着战争，关心着在战争中的人群，而且尽量地为时代尽他个人的力；或者仍然闭着眼睛，装着耳聋，继续从事他自以为是不朽的艺术的创作。前者可以举罗曼·罗兰来说明。虽然他大声喊着“超乎混乱之上”，虽然他寄寓在瑞士，他仍然与当时的战争和在战争中的人群发生着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摇摇第二卷

密切的关系，他不但不断地写着许多勇敢地反对那种“不义的战争”的文章，而且不断地和前方后方的人们通着信。自然，欧洲大战与我们这次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两种截然性质不同的战争，我们对这两种战争本身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不过，在工作的态度上，在热烈的关心着战争和在战争中的人群，而且企图竭个人的力量以贡献于时代这一点上，仍然是一样的。后者也可以举一个代表。这要感谢梁宗岱先生，全靠他一篇评传我才知道在那有着罗曼·曼兰的法兰西也有着一个象征主义派的最后的诗人，保罗·梵乐希。欧战当中，他在一个政府机关里当职员，写着他那五百余行的长诗，《年青的命运女神》。而且据说那长诗出版后有一个批评家写道，“我国近来产出了一桩比欧战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罗·梵乐希的《年青的命运女神》”。在这里，我并不想攻击梵乐希，只是我要说那位批评家假若不是像一个仅仅读过一年高中的十九岁的孩子那样无知，就是无耻。欧洲大战中死伤了三千万人，三千万活生生的人，不说五百行长诗，就是五千万行长诗也不能相提并论。只是说漂亮话是不行的。

然而我那时仅仅读过一年高中，读过一月多的大学，而又在失学期中。梁宗岱先生那篇评传是我对于法国象征主义派的作品入迷的第一个阶梯。我那时是非常可笑的，并不能直接读法文的书籍而竟对法国的文学那样倾心。

那时是什么时候呢？“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接着是热河失陷，榆关失陷。然而我正做着“一些美丽的辽远的梦”，明白点说，就是胡涂地过着日子。直到大学二年级，直到《塘沽协定》之前的那一度华北局势紧张，何应钦将军准备背城一战，因而各学校通知学生

星火集

离校，因而我也离开北平的头一天晚上，我还在一个小公寓里写着《画梦录》里的那一篇《黄昏》：

摇摇摇摇马蹄声，孤独又忧郁地自远至近，洒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

现在提起这些来我是非常感到羞耻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并没有一个朋友痛痛地骂我一顿，而我所读的又全是那类书籍。

所以说到工作，无论或大或小，影响总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慎重。

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成都。

论 本 位 文 化

三月十二日《新新新闻》上载有某先生在重庆沙利文的餐后谈话。首先说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在于丧失自信力；最后的结论是重新建设中国的固有文化；中间还谈到中国是农业社会，父子兄弟一同劳作，不分阶级，结果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唱妇随，而欧美是工商业社会，以个人为单位，致父子兄弟夫妇之关系疏浅，为文化崩溃之始，因为一切都不可靠，只有我可靠，一切都不可爱，只有钱可爱，结果遂产生个人自由与唯物史观。

这使我想起了到成都后的第一夜，我睡在一个相别多年的旧同学的屋里，谈话谈到很夜深，其间也就提到了本位文化，结果我害了一礼拜的伤风。

本位文化，或者固有文化，虽说它因持论者的不同而有多种的

星火集

解释，大概是指我国两千年来在儒家思想笼罩之下的文化吧。关于非固有文化，特别是西洋文化，我是准备不加评论的，因为我不大清楚，不过读了一点简单的世界历史，一些外国小说。然而说到固有文化我却是有意见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亲身感受，我深蒙其赐。

在这里，我只想说出我很久以来就感到我国的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缺乏“人”的观念。在我国的文化史上没有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那样一个时期，而且儒家思想是根本忽视着“个人”的。

我们这民族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方面诚实的知识分子已和罗曼·罗兰一样深切地感到个人主义者的短处，软弱无力，一方面不近人情地忽视着个人的儒家思想还是有力地存在着。儒家的伦理观念总是对待的，尊卑，长幼，贵贱，在朝廷中不是君就是臣，在家庭中不是父就是子，不是兄就是弟，不是夫就是妇。人是一样的，却偏偏要分出高下。人的情感是一个，却偏偏要分作许多种。这中间必然会产生虚伪和悲剧了。然而虚伪和悲剧是迂腐的儒生们所不注意的，历代的统治者却见到了这种分割人，分割情感的学说是很有用的，可以训练顺民。自唐以后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因为儒家思想的势力越大起来，而又加上了宋朝的理学家们的那一套。元明清三代简直就像一个“黑暗时期”。

现在我们不是希望着失陷区域的民众起来反抗敌人和汉奸的统治吗？不是又慨叹着民气的消沉吗？我们应该归罪于一千多年来的专制政体之下的顺民训练。在自家人的训练下成了顺民，在敌人的